

邓小平经济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仪 昂

邓小平经济理论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继承与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邓小平经济理论，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系统地阐述和回答了我国经济领域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揭示出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规律，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发展和巨大贡献。

一、邓小平经济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形成过程

邓小平经济理论形成的实践基础是党和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新的历史创造，是对这一崭新实践的科学总结。可以说，20世纪以来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是邓小平经济理论形成的宏大历史背景。邓小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逐步形成和发展从目前已发表的文献来看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

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经济理论初步形成阶段。

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冷静地估计了形势，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①他重新确立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着手清理传统经济理论中许多错误的观点，进行理论创造。这些探索成果比较集中的体现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中。该决定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要求出发，确立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并提出了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②

2.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邓小平经济理论趋于成熟的阶段。

邓小平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公布后，人们就会看到我们全面改革的雄心壮志。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③在这

一阶段，邓小平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党的十三大报告中集中体现出来该阶段的探索成果。该报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概括，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思想上初步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3. 党的十三大到“南巡”谈话：邓小平经济理论臻于完善的阶段。

这一阶段我国经历了国内风波和国际局势的巨变。一系列严峻的考验促使他和人民一起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冷静思考，进一步深化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进而精辟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确切含义。

二、邓小平经济理论是一个庞大而系统完善的体系

它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它从思想上解决了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最基础的问题，以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核心问题。

1. 邓小平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基础问题——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和重大使命，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通过对我国以往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总结，通过几十年的悉心观察和冷静思索，通过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鲜经验的科学研究，精辟地提炼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含义，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④这一科学论断，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富有创意，彻底解决了多年来人们思想上的困惑和疑虑，使人们真正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同样不是社会主义；

这一概括，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统一为逻辑严密的整体，深刻解释了其中一系列辩证关系，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社会主义本质所做的概括，是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这样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纠正了以往多年来离开生产力而只知从生产关系上给社会主义下定义的偏颇，纠正了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的错误认识和观点，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境界，从而真正从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体的生产方式来看问题。马克思依据资本主义与人类社会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的联系，揭示出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理由，历史使命和历史的暂时性，指出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是不自觉地通过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准备物质条件；邓小平则揭示出比资本主义更快更高的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理由和自觉地为共产主义准备物质条件的根本任务。但是事实上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从这种现实出发，邓小平则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慢了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必须自觉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社会主义最深刻最抽象的内涵。它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域的外在表现形式构成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在基本经济关系即基本制度方面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这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以此为制度保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消灭剥削的前提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除两极分化。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⑤“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⑥这样邓小平就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根本任务和发展目标有机地统一了起来，纠正和廓清了在对待生产力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片面认识和模糊观念，为我们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正确把握“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提供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2. 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核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整个邓小平经济理论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它是在着眼于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结合中国的特点，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的探索中逐步形成起来的，是对传统理论的重大突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增添了新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

长期以来，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者，人们都把计划

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这似乎已成为定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按比例配置资源为出发点，认为市场自发调节会产生无政府状态，比例破坏，资源浪费等种种弊端，从而推论到未来社会的“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在那个时代，未来社会建立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方式，只是一种推测和预想，它所需要的前提条件也不具备；列宁是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第一个使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这对范畴的。他依据马、恩的思想，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联系在一起，并且把它看作是未来计划经济制度的对立物，认为两者都具有基本制度的性质；斯大林更对计划经济作了许多具体规定和阐述。多年以来高度集中的单一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充分发挥出来。为了给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我国经济学界从 50 年代开始就开展了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讨论，这种讨论时断时续，由于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多种因素的制约，人们始终未能冲破市场经济的禁区。

在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严重束缚人们思想的时候，邓小平以其革命家、改革家、战略家的非凡胆识，高瞻远瞩，深入思考，敢于创新，独树一帜，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认为，我们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没有搞清楚。我们决不能要求马克思来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邓小平在改革一开始就对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论断持怀疑态度。他在 1979 年 11 月会见美国客人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⑦而在 1985 年 10 月他又一次针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指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在于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的发展生产力。”^⑧此后他基于我国以市场取向的改革的成功经验，反复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⑨，“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⑩等。邓小平在实践的基础上，以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为标准，用“中性论”，“手段论”消除了近一个世纪以来用计划与市场判断“姓资姓社”的困惑，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范畴的思想束缚。

就最直接的意义讲，邓小平作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就是要改变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类非本质因素分别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还他们作为经济手段的本来面目，从根本上解决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所用的问题。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进行生产，要进行生产就离不开生产要素即经济资源。一个国家既定期可利用的资源总数是有限的，因此就有一个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资源配置的好，就能

对资源充分开发利用，把它们分配到效益最好的部门并保持合理比例，使同量的总资源就会发挥最大的生产力。反之，资源配置不好，生产力就发挥不出来。在现代社会，资源配置既有国家有计划的行动，又有市场机制在起作用，问题只在计划和市场各处什么地位。这些说的是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它决定经济效率的高低。由资源引起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们的所有制问题，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它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经济关系。一个资源配置问题，一个资源所有制问题，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两个基本经济问题。二者既紧密相关、相互影响，但又分属相对独立的两个范畴。生产资料所有制属社会基本制度范畴，计划和市场属资源配置方式，不体现不同社会的本质区别。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马歇尔的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自由放任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占统治地位。然而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的爆发，表明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已经失灵，代之而起的是罗斯福总统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实践和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与自由放任主义相对，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为依据提出放弃自由放任政策，扩大政府权力，实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以保证社会足够的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推动了新的由国家调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发展。这样，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更证实了邓小平的“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⑩的科学论断。

社会主义必须搞市场经济。社会经济的发展表明，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有效方式。市场经济由于其本身内在的机制，能使企业内有动力，外有压力，促使企业不断改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等优势。与此同时邓小平非常强调，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⑪，“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⑫。我们既要看到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不足和弱点，必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缺一不可，决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要实现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既要大力发展全国的统一市场，进一步扩大市场的作用，又要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促进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既要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合法劳动先富起来，又要运用个人收入调节措施，防止两极分化，依法制裁不正当收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三、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除

上述“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外，还有“社会主义经济阶段论”、“社会主义动力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论”等。所有这些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原有的理论相比较，都有了重大突破和创新。时代的发展呼唤着理论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必须不断纠正经实践检验证明是不符合实际的某些结论，补充符合时代前进规律的新内容。恩格斯曾经说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的和改革的社会。”^⑬邓小平经济理论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写下了新的篇章，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起了新的里程碑。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邓小平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邓小平在创立他的新的理论体系的时候，坚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思想。他明确指出：“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的基本思想。”^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不承认这种突破和创新，就不可能认识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大意义，也不可能理解20年来我国的改革路线及其带来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伟大成就。

邓小平经济理论对于当代世界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普遍意义，也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深远的影响。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照搬给别国”。^⑮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第一次初步但系统地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何巩固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它是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振兴的理论起点，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走向复兴的理论起点。邓小平经济理论中的基本论点和重要思想焕发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生命力，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巨大贡献。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邓小平文选》，第3卷，157、83、82、373、172、364、148、203、373、373、138、62、1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⑦⑫《邓小平文选》第2卷，236、2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7卷，4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生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曾德国)